



# 第7届世界华商大会 7<sup>TH</sup> WORLD CHINESE ENTREPRENEURS CONVENTION

2003年7月27日至30日·马来西亚吉隆坡  
27- 30 JULY 20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 名人讲座 FORUM BY DISTINGUISHED PERSONALITIES

### 儒家伦理道德是否还有地位？ IS THERE A PLACE FOR CONFUCIAN ETHICS?

主讲人 : 王贇武教授  
SPEAKER : PROFESSOR WANG GUNGWU

未经作者表明同意，本文任何部份或全部一概不得以任何方式如印刷或电子方式摘录、转载。本文所表达的意见、意见，纯属作者个人意见。主办单位有权出版文章内容，作为大会进程的一个部份，本文产权及版权皆属主办单位与出版人所有。出版本文的目的在于公告、便于讨论，而不等于赞同部分或全部观点或内容。

Not to be quoted or reproduced in part or in full, and by whatever means or medium either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 without the expressed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The assessments and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entirely the author's own. The organiser reserves the right to publish the text of presentation as pa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nvention, which shall remain the property and copy right of the organiser and publisher. The publication is intended fo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and is not to be taken to constitute institutional endorsement or support for the views expressed or the contents in whole or in part in or in any way whatever.

# 儒家倫理道德是否還有地位？

王賡武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暨香港大学前校长)

儒家經典談論的是個人德性和社會關係的普遍性問題。這些經典傳授知識和智慧，使人成為識禮的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一個良好的社會建立在道德基礎上。因此，人必須有教育，遵守家庭的一切禮儀和責任；有良知和培養別人的信任，以及善用天生的智慧，辛勤工作。在中國的歷史上，以上大部份的思想，對從商者有用處。事實上，我們知道成功經商家族所提倡的素質是孝悌、仁義、禮讓及忠恕。

儒家道德注重於我們學習的能力和準備奉獻予家人、社會，即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然而，在古時候，達官貴人以為只有少數人能做到這點，成為社會領袖。他們認為從商者有他們的用處，但能扮演的角色有限。如果從商者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必須和別人一樣以仁義待人，但是仁義不是生意。因此儒家輕視從商者，沒有給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而把商人的貢獻局限在中國的工商方面。

我想，我應該先檢討商人的這個地位，以了解儒家思想在今天的意義。我先要談談儒家思想過去幾千年來如何適應時代的一些歷史評論。事實上，儒家思想開始並不是為人所接受。在春秋和戰國時代的幾百年的大變革動蕩時期，儒家思想幾乎沒落。當秦國在法家的襄助下于公元前 200 年統一天下后，儒家思想完全失寵。在漢初，一小撮儒家繼續主張賢人政治，以德政、禮治君臨萬民的仁政思想。過後，儒家受到漢室的器重以提供治國的新意識形態。從此，儒家士夫階級極力發揚儒家的思想，同時和“法家”所主張的治國方法妥協。這包括嚴刑峻法和嚴格管治被認為對國家沒有什麼價值的商界。

儒家對“利”的看法重要。一方面，儒家主張統治者都要“羞利”，不要追求財富，也就是不與民爭利，涉及和人民競爭的事務。不過這也意味著財富是不義的，統治者和士大夫應該讓從商者去造求財富。另一方面，商賈有他們的用處，因為他們肯冒險供應人們的所需。不過儒家認為“利過則為敗”，以欺詐手段牟取暴利、操縱物價的行為、貪官污吏等必須受到遏制。市場必須由一些家庭和社會的道德原則去管制，即使這會局限商賈階級也在所不惜。

這麼一來，儒家的勢力得以膨脹，國家的整個統治制度變成專制。國家的大權落在那些不理會工商的人手中。這些士大夫對經濟的關心只是確保人民有溫飽，有足夠的賦稅應付國家的需求。他們能審時度勢，在人口增加，更多土地開辟，生產更多財富后，適應潮流。但是他們鮮少肯定商賈對國家長期穩定所作的貢獻。可幸的是，商

賈往往受到普羅大眾的賞識，尤其是施舍行善，在地方上有了名氣之后。

大部份商賈很聰明，他們採納了儒家的倫理道德，以討好官吏。在某些情形下，一些商賈在社會上取得了崇高的地位，例如 15 世紀過后的著名《徽商》(徽州)和《晉商》(山西)。不過，儒家的目的是最終使商人變成更有儒家氣質的《儒商》，而甚至不惜犧牲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因此，現代的改革者和革命者都認為儒家思想是進步的絆腳石。他們也認為儒家思想不能促進創新和競爭，而創新和競爭正是歐洲工業革命成功的條件。明顯的，儒家士夫並沒有提倡對工業革命產生推波助瀾作用的科技。

當我們今天談到儒家思想時，我們應該注意到企業家如何在來勢凶凶的資本主義壓力下的掙扎求生。在面對這些壓力時，儒家倫理道德又有什么作為呢？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推尊儒家思想或聲稱追從儒家學說。儒家知識界似乎和時事完全毫無關係。有人常常說新加坡政府追隨儒家思想。然而，新加坡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它有嚴明的法制保障人民的財產和工商界，而跟儒家思想價值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商業道德，或是商業道德淪喪的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對那些相信全球市場必須有良好的商業手法的人來說，商界的不義之舉，是很令人不安的。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在競爭劇烈的世界里，要信任商人，是值得懷疑的。近年來，美國大企業安然集團的倒閉，揭露了美國企業腐敗的手法和會計手段，加劇了人們對商人的疑慮。

我個人認為儒家思想目前處於一個艱難的境地。今天的儒家思想經歷了一番關於這種傳統是否可以古為今用的痛苦爭論。儒家思想在中國 1919 年五四運動后的重要十年期間掀起的《打倒孔家店》的運動中，備受口誅筆伐。在幾年內，年輕一代群起造反，要擺脫這種古老‘封建’哲學的枷鎖。這股反儒家的浪潮主要是由於報刊向廣大的讀者發表關於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想的文章后所引發。這場運動所激起的辯論，使到年輕一代對統治“王朝”和滿清政府的唾棄。他們批判過時的價值觀使到中國不能自強、任人宰割、侮辱。人們提出了許多唾棄儒家思想的理由；特別是那些失意的知識份子、商人和要求徹底改革的激進份子。他們把矛頭指向那些導致中國沒有現代化的儒家官吏，并要求引進西方的價值制度，取代儒家思想。其中一派選擇了國民主義，以建立一個強大的新國家；而另一派則投向共產國際主義，團結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反抗西方列強和日本。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兩派都不能對華商今天所取得的經濟成就而居功。

失意的商人是那些沒有參與中國現代化的人。他們需要一種價值制度幫助他們在通商口岸和資本家一比高低。他們可以投靠國民黨，但是國民黨政治人物卻認為商人以利字掛帥，把個人功利放在國家利益之上，不是真正的愛國者，因此不可信任。共產黨人對商人更沒有好感。他們把商人看作是隨時準備剝削那些支持共產黨的工人階級的未來資本主義者。他們被比喻為不把國家利益放在心里的買辦。

因此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末期，儒家思想已經與時代脫節，對國家的建設、支持

社會主義或栽培現代商人，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因此，儒家思想給人的印象是日益消極。不過，有趣的是，不少談論儒家思想的著作、文章、辯論繼續出現，顯示儒家思想“陰魂不散”。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和紅衛兵極力號召把儒家思想徹底連根拔起，顯示儒家思想依然存在。雖然當時毛派沒有商人可以作為批判的對象，但毛派對儒家思想的批斗，提醒我們：儒家思想價值在社會根深蒂固，即使是翻天覆地的革命努力也無法把儒家思想完完全全地根除。

儒家思想被批判也提醒我們另一個矛盾的現象。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層次上，儒家思想早已煙消云散。一切要振興儒家思想或以類似思想取而代之的努力都似乎注定失敗。舉個例子，共和國（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都是先後以法國、美國及前蘇聯為模式，而這個模式和儒家思想格格不入。但是，在社會的其它層次上，尤其是鄉區的農業社會，仍然對一些通俗的儒家思想忠心不二。此外，有證據證明儒家價值觀在諸如韓國、台灣、香港等地，依然盛行，即使那里的大部份年輕企業家是在西方受教育。

在中國大陸本身，那些仍舊生活在家庭隱私世界里的人——無論是在鄉村社會或遷居城鎮——還是希望傳承儒家價值，特別是規定父母、子女、鄰里地位，甚至作為好公民或同志的個別角色的儒家價值。由於商業交易受到限制，沒有充份的證據證明道德倫理問題取決於儒家道德概念。不過，在大陸以外的華人，每個層次華人對儒家思想的反應則有比較妥善的記載，而且他們的反應也更多樣化。舉個例子，盡管核心家庭（這種小家庭導致大家庭的沒落）蔚然成風，維系他們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習俗、宗教、宗親關係、地方性和行業組織，持續存在。在每個國家（包括華人占少數的國家），家族和商業之間的連系，以順應當地的習俗和現代法律和一個更侵入性的現代民族國，而得以注入新的力量。因此，當家族生意繼續成為支配經濟活動的途徑時，家庭價值持續成為重要的因素。雖然家族生意漸漸受到偏向於產權和商業公信力的法制所保障，在大部份情形下，家族生意依然占了上風。目前許多家族公司繼續經營有方，證明了這種方式調整的傳統做法行得通。

儒家倫理道德某些方面在極為不利的情況下生存，提醒我們當我們談到今天儒家思想的意義時，必須有所慎重。既然在過去一百年里，儒家思想被許多“最杰出、最優秀”的中國人所唾棄，為何它還是當今社會生活和經濟的一個因素呢？為何人們依然認為這套價值觀在華人（和朝鮮人、甚至日本人及越南人）的社會和商業生活中，保留著重要的地位呢？我不認為個中的原因是因為在整體上，儒家思想是一種哲學。更重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孔子在《論語》中對家庭和社會秩序的核心思想所包含的基本普及性，而不是后人論著的誇大其詞的說法。其次是世紀以來，在面對外來侵略或新思想的嚴峻挑戰下，人們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對儒家思想的詮釋、貶低、重新定型的方式。這些過程使到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可以逐漸應順社會的變遷。在商業道德的意義上，儒家思想的普及性強調商業應該考量到家庭、宗親之間與生俱來的連

系，而且根據對基本人際關係的了解，建立信任。在了解這點以及家族為主的商業結構能夠生存的情形下，商業將更容易協調他們和國家的目標。商業能爭取到官方的尊重不只是因為越來越多官吏涉足商場，而且也是因為國家越來越依靠商業獲取賦稅。這種現象的發生也是因為15世紀過後，更多商人已經熟讀經典，掌握了儒家的語文，可以把儒家倫理道德融入他們的生意手法中。因此，他們能利用體現在國家制度里的儒家學說，以支援商業上的需求。隨著商人漸漸建立了關心價值觀的風範後，儒家思想從前對商賈階級興起的束縛，也逐漸被沖淡。

簡言之，在過去5百年里，中國商人在他們的商業交易和關係里，發展了和他們相關的儒家倫理道德。通過實驗方法，他們選擇了認為有用的儒家觀念和把它們融入他們的生意大全里。儒家所主張的“仁、義、禮、智、信”不需要太多的哲學思考。一如Samuel Smiles(著名蘇格蘭作家)的箴言，這些儒家理念構成了宗族集團內外建立商業連系的基礎。這不但證明有助於建立一個昌盛、負責任的商人階級，也緩和了儒家對商賈的束縛。

今天，究竟儒家倫理道德對商人有何重要呢？即然商人現在已經完全發展了法治制度，他們又何必借助儒家思想呢？商人的成功是否是因為有了儒家思想因素，或是因為他們不理會儒家思想？即使商人聲稱儒家倫理道德價值對他們重要，也只不過只限于個人的修養而已，或是他們認為他們的成功有賴于以正確的儒家方式經營生意？

### 3. 整頓和生存

從上文所述，明顯的，儒家思想有著不同的形式。其中作為某個朝代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早已一去不返。如果儒家思想要在權力走廊重現它的地位的話，它必須適應共和國的語言、適應新的自由標準、適應民主、平等、人權的呼聲。我不低估儒家思想的伸縮性，因為畢竟它過去多次適應時代的變遷：它曾接受了法家殘酷的嚴刑峻法；它制服了但未排除農民階級天下太平、人人平等的主張；它被重新詮釋以包容不僅是佛家的慈悲，而且包容了佛家的玄學；它也可以適應朝鮮、日本及越南人民不同的文化需求；最重要的，儒家思想在征服中國的“蕃族”——契丹、女真、蒙古、滿族等鄙視漢族的統治下，繼續存在，而且證明要統領天下，必須有儒家思想。因此，誰又能說儒家思想不會繼續適應當前時代而生存下去呢？

然而，即使儒家思想可以適應，它是否是原封不動的方式，或是含有什么新的重要成份？明顯的，孔子主張的“有教無類”思想，在知識經濟里，是最恰當和最具彈性價值。不過這需要作一個調整，也就是無論男女，都應該“有教無類”。事實上，這種概念已經被廣泛接受。越來越多女性投身現代專業，或考獲技術和工程學位，已不再有什么違反儒家的色彩。另一個儒家理念是修身。這關係到一個人肯辛勤

工作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和節儉投資。關於工作，現在的辦公室和工廠的各種程序和制度，已經把工作現代化；至于節儉和投資則有經濟作用，這可以跟歐洲的新教徒倫理道德觀念相比。

儒家思想同樣重要的是誠信。“君子養心莫善于誠”。這種誠信也許不是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美國日裔學者)所提及的大工業和資本主義企業所應有的誠信，但它還是目前成為中小企業主幹的家族企業的基石。只有人們繼續認為這種誠信導致企業依賴家族結構和助長朋黨及裙帶風，我們都不能確定這個儒家價值是否對大公司有所幫助。不過，有一點是值得參考的。那就是日本人如何把對家庭的孝悌變成對封建主子的效忠以及變成今天對現代公司的效忠。人們也從來沒有把這種視為有違儒家思想。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東亞其它國家不會以日本人的這種經驗作為借鏡。不過，全球市場經濟的挑戰也許不允許這種效忠持續太久。但是我們應注意的是，當有了可以衡量和預測的酬報導后，效忠是可以轉移的。如果這導致新的倫理道德公式后，我認為人們也不會覺得這有什么違反儒家思想的地方。

在今天的現實中，儒家經典中所沒有提到的兩點，是法治和商人階級增加財富的地位。儒家思想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包含了大量王朝政府的行政法律和政治、社會秩序。我們知道，雖然儒家官吏為了經濟秩序和發展，而勉強採納一些必需的法律。究竟這種適應的能力是否會使最終使到儒家官吏接受社會各階層的法治，目前不可斷定。不過這個問題將根據實際的情形而決定。至于商人的地位，今非昔比。例如，商人作為一種跨越國界的企業家、工業家、金融家或當地和國際政治活躍份子的地位，和儒家的想背道而馳。因此，儒家思想和制度的重新整合必須考慮到商人階級在為現代國家效勞時所發揮的力量。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再參考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現代企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些地區，政治和商業互相貫穿并不沒有明確地排斥儒家的價值觀。如果這種情形繼續演變，那么儒家的道德倫理在商人階級的社會、經濟關係中有存在的價值。它也可能對如何協調中國今天的商業和政治力量，產生重大的影響。

我們注意到北京政府對腐敗所造成的問題特別敏感。政府頒布了連串措施對付腐敗的商人和官員。中國政府所表現的決心可以導致中國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走去。一是建立新的法制結構以鏟除不道德的活動，誰都不能免除；不然就是恢復比較舊式的官吏控制商人階級的制度。無論這些改變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它肯定和史冊中所記載的儒家思想盡不相同。但它能再次展示任何對中國不會改變的呆板描述都是站不住腳的。儒家思想有很大的適應能力，因為它的道德倫理價值的核心很小，全世界都通用。不過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是，儒家為國家和社會提供一種入世的方法。直到現在，這種態度最適合西方贈送給全球化時代的后啟蒙運動現世主義。

我們沒有可靠的數據說明今天有多少企業的成功是靠儒家價值而爭取到的。個別的商人(特別是東亞各地的商人)也許會說，他們之能夠創業是靠刻苦耐勞、克己復禮、

節儉投資；而且我們在教導下一代經營現代生意錯縱複雜的方法時，也必須向他們灌輸基本的價值，例如以誠信待人等。但是在經營現代企業時，最重要的因素是能夠與他人一爭長短，而且要準確、快速地競爭。明顯的，今天那些俱備最佳競爭力的人，並沒有借助于儒家思想。我們知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商人把有用的儒家思想融入他們的生意，以適應新技術、包括管理和創新的方法。商人也許會發現，對高科技的競爭採取包容的態度，並不違反儒家思想。

因此，我得到的結論是，儒家思想對那些繼續傳承某種形式和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儒家價值的人，也就是華人、朝鮮人、日本人及越南人來說，儒家思想還有它的用處。對商人來說，儒家思想對工作（尤其是用現代的語文來解釋這思想的意義）的恰當性也許是無意識和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不認為儒家思想會以一套整體的思想方式——即使是某種現世的宗教形式——傳播給東亞以外那些未曾受到儒家漫長、複雜歷史所浸染的人。不過我預料上述的儒家思想核心價值可用一套重新整合的原則方式，繼續存在于那些曾直接體會儒家思想好處的人當中。只要東亞的政治、商界。各專業領導人認為儒家價值在他們個別的社群里有用，而且相信這些價值不阻礙他們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那麼這些價值將得到新的力量和恰當性。如果經過重新整合的儒家價值證明有效地幫助世界其它地區克服新危機的話，其它社會和經濟體也許會認為儒家價值是理性和有益的。這將使孔子的思想有個機會重現儒家思想所主張的大同主義。

（此稿件中文譯本之詮釋如與英文正本有不符之處，一概以英文正本為準。）